



[苏]康·西蒙诺夫 著
章 其 译

我写斯大林

——我这一代人的见证

● 武汉出版社

我写斯大林

——我这一代人的见证

[苏]康·西蒙诺夫 著
章 其 译

武汉出版社

330430

我写斯大林

——我这一代人的见证

【苏】康·西蒙诺夫著 章 其译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9号 邮政编码430010)

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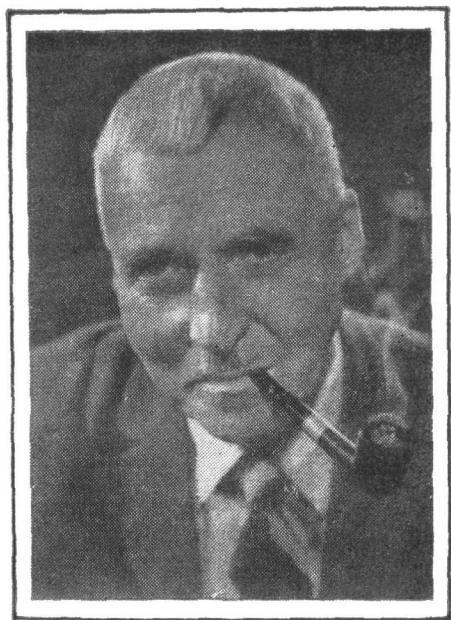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12 插页3 字数24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4.20元

*

ISBN7—5430—0541—7/I·68 (内部发行)



作者 康·西蒙诺夫

Б. 74

译者的话

这是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可惜这部作品的第二部《斯大林与战争》他还未及执笔，就与世长辞了。

这不是一部稗官野史，而是一部情真意切的回忆录，它完全可以诱发我们对一个曾为之欢呼与哭泣的历史伟大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

任何一个历史伟大人物，特别是象斯大林这样一位曾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达1/4多世纪的人物，他的功过是不可能互为抵消的。是功就是功，是过就是过，夸大或缩小都无助于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是本书作者的写作动机，也是译者推荐这本书的缘由。

真诚、朴实比什么都美。我就是为作者这种真挚的感情所激动而执笔译出这本书的。

作者不以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以亲身的经历和见闻，通过自己的思考写出了苏联在各个时期以及各种事件中各方面的反应，翔实地勾勒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作风和他在苏联历史以及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

由于作者是少数能与斯大林接近的作家之一，所以书中有许多史实，特别是**文艺界**的情况鲜为人知。作者毫不掩饰个人的感受，真诚而朴实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对斯大林的功过都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自己的评判。此书写于苏联实施“公开性”之前，最近才公之于众，可见作者临终前写出这本书时心怀坦荡，不尚虚声。

为了年轻的一代了解一点作者的情况，我在此向读者作简单的介绍：康斯坦丁·米海洛维奇·西蒙诺夫（1915—1979）出生于一个旧军官的家庭。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曾任《文学报》、《新世界》等报刊主编、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职。1939年任《红星报》军事记者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的创作。他的创作面很广：诗歌、戏剧、小说、随笔、评论都有建树。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译成了中文，如：《我城一少年》、《俄罗斯问题》、《俄罗斯人》、《在布拉格栗树下》、《异邦暗影》、《日日夜夜》、《祖国炊烟》、《战斗的中国》、《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等着我吧……》、《友与敌》等。1949年10月他曾作为副团长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11月初曾来武汉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和中苏友协

武汉分会成立大会。西蒙诺夫曾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得一枚列宁勋章。

在这本书的译述过程中，得到许多亲友的帮助，诗人曾卓看了此书的手稿后热情地写了一篇序言，我在此深表谢意。

章 其

1988. 8 .31于武汉

中译本序

曹卓

康·西蒙诺夫在这部回忆录的开始就表明：“在最近可以看到的将来，我并不希望它全部拿去发表。我打算把它完全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并怀着一点希望：这种出自我这一代人的个人的见证和思考，能够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历史学家发生一定的兴趣。”这部书写于他的晚年，可能是他的最后著作。形势发展很快，他大概不曾料到，这部书写出后不到十年，就得以全文发表了。而且这的确已成为一本历史学家和当代读者普遍感兴趣的书籍。

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有着伟大的功绩，这是不容抹煞的。当他在世时，虽然从西方也传来了一些关于他残酷地镇压坚贞的共产党人和无辜平民等等报道，但一般人并不认为那是可靠的，至少也应该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形象。有两位法国作家所写的关于

斯大林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一本是布洛克的《共产主义人物——斯大林画像》。前者记述了斯大林的前半生，后者则是作者作为记者记载了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所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斯大林的事迹。这两本书所刻画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光辉的。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他的另一面，或者说，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他。我当时没有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看到了一些零星的材料，特别是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认为这是一本写得相当客观的书，勿宁说，作者是在为斯大林辩护，那里面所揭露出来的某些阴暗的事实应该是确凿的。这几年来，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更是大量出现，有助于我们对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由于斯大林在苏联有着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地位，只有真正认识和了解斯大林，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其中所显示的某些现象，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经验教训，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众多的有关斯大林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的这一本有着其独特的意义。西蒙诺夫出生于1915年，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

新人。他在年轻时，就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可见他是深受斯大林重视的，他对斯大林不致怀有偏见。他有多次直接与斯大林接触的经历。作为一个作家，他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就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异常生动，他只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过去不大为人所知的新材料，特别是斯大林与文艺界之间的关系。西蒙诺夫并没有企图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只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接触，写出他所认识的斯大林，并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感想、感受，因而就显得特别亲切。同时，他也写到了他所接触到的其他苏共领导人和某些作家的情况。

在回忆录的开始，西蒙诺夫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他青少年时期家庭中的遭遇和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斯大林时代的社会背景，他的继父，苏联海军委员会的军事专家，一个正直、诚实、坚强的人，曾于1931年被逮捕，家也被抄，当时西蒙诺夫的母亲正在

病中。他的继父后来虽因无罪被释放了，但在年轻的西蒙诺夫心中不会不留下一些阴影。由于所见到的这一类事件太多，他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就习以为常了。同时，他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亲见了苏联建设的伟大成就。后来，他又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艰苦战斗和伟大胜利，所以对斯大林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冤屈习以为常；有困惑而不敢说出来。这就是西蒙诺夫当年的心态，大概也是那个时代一般苏联人的心态。

后来，从1946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他感觉到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发表过许多明智的意见，也作出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感觉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演员。——通过那些详尽的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复杂的个性、工作作风，也看到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以及那些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的态度。

有关斯大林与文学界的情况，当然是使我感兴趣的，但更引起我震动的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种种情景。在苏共十九大以后的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斯大

林以激烈的、严厉的言词抨击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责他们不坚定，认为他们怯懦和有投降的倾向。而那两位政治局委员就在他身后不到两公尺的位置上坐着，脸色苍白。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是面容紧张，一动也不敢动。他俩虽然后来也讲了话，作了辩白，但未必就希望斯大林改变对他们的命运已作出的决定。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但我们却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晚年，他是孤独的。因为他有无上优越感，没有可以对他进言的人，没有敢与他争论的人，他拥有的无上的权力不仅造成了许多错误，也逐渐把他自己毁掉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别的领导人虽表示悲痛，却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紧接着西蒙诺夫又写到了贝利亚的种种阴谋活动和他的可耻的下场。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西蒙诺夫的这部回忆录，刻画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的一些遭遇、感受，也刻画了他直接与斯大林接触中所产生的印象和感受。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记述是真实的。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历史内幕。这部回忆录是口述后整理的，所以稍嫌零乱，但却保存了一种亲切感。章其同志的译文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风格。我知道他是在今年武汉的酷暑中赶译这部书约。他的辛勤的劳动将在读者的满足中得到补偿。

1979年2月23日

首先要说，我今天开始动笔的这部手稿，无论如何，在最近可以看到的未来，我并不希图它全部拿去发表。我打算把它完全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并怀着一点希望：这种出自我这一代人的个人的见证和思考，能够有朝一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历史学家发生一定的兴趣。至于说到这部未来手稿的某些部分，那我并不预先排除，我可能产生一个愿望，或者我本人有可能看到它们发表。

从斯大林去世的那天起，到去年已过了1/4世纪。然而我很难想起，在这今已差不多是26年多少有点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评价斯大林个人及其活动，评价他在我国的历史和几代人的心理中的地位问题，什么时候不曾这样或那样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直接地在我从事文学工作的过程中，或者是间接地在同读者的通信中，同各色各样的人就各种不同的问题的谈话中都曾经常地导致我们议论斯大林并为他进行争论。

由此可知：斯大林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对于这样的

人物，无论在书写我们社会历史，还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中（尽管这一生无限渺小，但总还是这个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要想避而不谈，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将作为我这一代的人来写斯大林。当斯大林在党16大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明白而又不可动摇地确定为我国、我党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人物时，这一代的人已有15岁；而当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是38岁了。今年，当他满100岁时，我们就成了64岁的人了。

在讲到我这一代人时，我说的是活到这64岁的人们：1936—1938年的几次镇压把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从生活中除名的，比之我们的前几代人，为数少得多；可是战争却把我们差不多一半人从生活中勾掉了，尽管战争还不是频频发生的。

因此我预先说明，第一，讲到我这一代人时，我指的是那一小部分活得比斯大林长久的人，而不可能指那大部分在斯大林在世时成长或死去了的人。他们如果不是象我经常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所说到的那样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的话，那么，不管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对斯大林的行为只作同一涵义的评价，而不加任何批评的。所以我将要写到的许多事情，他们绝不会接受——直到他们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小时都不会接受。

第二，在191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中，我属于不太广大的，更正确地说，大概是非常狭窄的圈子里的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职务和社会活动而有机会同斯大林多次接近。我曾同两位已故的同事，因苏联作协的事务，受斯大林接见了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同他在电话中谈到我个人的文学工作的问

题，我曾好几次出席政治局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的会议，每次都进行几个小时。参加这些讨论的人有作家，其中包括我。我不仅聆听过斯大林在党19大上最后的一次演讲，而且还听过他显然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最后一次发言。后来我又在圆柱大厅内好几个钟头挨近地看着躺在灵柩里的死去的斯大林以及走过这灵柩的人们。因此，一些在我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及其活动的过程中曾经起过而现在还起着作用的、直接的印象，有一部分我已写了下来，而有一部分还留在记忆中。

第三，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文学工作者，40年来不变地、几乎毫无例外地从事战争题材，首先是伟大卫国战争题材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接触到有关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有关我军溃败的原因和取得胜利的根源，有关战争的突然性和我们对战争有所准备或毫无准备的程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创作三部曲《生者与死者》，而后来注释我那军事年代的日记，使我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题目：斯大林和战争。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在三部曲的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中去写斯大林直接出场的那几章，竟不懂得从谙熟军事问题的、知道伟大卫国战争起因的、在这场战争中起着显著作用并由此而多次或经常地同斯大林打交道的人那里，去获得对一个战前从事军事问题研究、在战时担任最高统帅的人——斯大林的认识和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可能更鲜明的概念。

在创作长篇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若干年中，我曾就这些问题同一些学识渊博的军人谈过话，谈话后我把他们的回忆、他们的意见都记了下来，有时我也把自己的想法补充

进去，自然，这都是作了严格区分的。在写完长篇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之后，我继续进一步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这10年的过程中，我还断断续续地作了我那战时日记《战争的不同日子》的注释工作。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许多前因后果都与斯大林个人有关，与他指导战争的性格有关。为了对我在注释自己的日记时接触到的这一系列问题作出自己的结论，我就尽可能广泛地探明那些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自然，这都是一些不同辈分的人，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预先声明。但是，所有从听来的和加以比较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是我本人作出的，我作为我这一代的人，自然就应该对自己作出的结论担负自己的全部责任。

最后，第四，从开始发表我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起，近20年来，乃至今天，不管我收到读过我那些战争题材的著作的读者多少封信，如果不是每隔两封，至少也是每隔三封，不管怎样拐弯抹角，都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斯大林和战争。许多信我都回答了，同意了一些人的见解，也同一些人发生争论，不过，无论如何20年来我都同源源不断的信息打交道：看到所有各种不同的人——社会地位不同、辈分不同、职业不同的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斯大林和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那些书就成了他们的意见的借口，但这仅仅是借口，而不是思考的理由。成为思考的理由的是我们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社会的实际历史。所以这20年来源源不断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信息，过去和现在都影响着我，不影响那才是怪哩——因此，在我现在着手写的这部手稿中，它就必然会有所反映。

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那4点原因，这部手稿的内容可

能显得较狭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相反，它的书名《我这一代人的见证》却又可能稍嫌过宽。

※

※

※

当我着手写过去遥远的事情，写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时候，最难对付的是这种诱惑：它唆使你把今日的思想同那时的情况拴在一起，以为这一来就显得更有先见之明，对时代的冲击更为敏感，对发生的事情更有批判力，说简单一点，就是比实际上的你更聪明。我竭尽全力摆脱这种诱惑。年轻的时候，我显然不是一个傻瓜，但我却无法想起那时我对斯大林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思考。我几乎想不起有我在场时家里作过政治性的谈话。我只模糊记得，当我的继父还在梁赞步兵学校担任战术教官时，家里对托洛茨基作为海军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有所不满。我记得，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喜欢他。我认为这可能与他对在红军中服役的军事专家的态度有关，当时我的继父也属于这些专家之列。我记得，伏龙芝来接替托洛茨基的职位时家里如何欢呼雀跃，后来他的去世又如何叫大家感到哀伤。伏罗希洛夫来接替他时大家有点惊奇，而且还有点不满，——看来，在象我的继父那样的人当中，存在着一种意见，伏龙芝死后的海军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空缺应该任命一个比伏罗希洛夫更出色和更懂得军事的人担当。这指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不过，这种口气在我们家里的谈话中是存在的。